

郭英德 主编

# 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 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郭英德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1-18733-3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016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

**著作责任者:** 郭英德 主编

**责任编辑:** 吴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733-3/I · 25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33.25 印张 511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目 录

## 绪论/1

-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1
- 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8
- 三、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综述/14
- 四、本书的基本构想与主要内容/27

## 第一编 教育制度与文学

### 第一章 制度保障与文学/35

- 一、汉代的小学教育与辞赋写作/35
- 二、明清女子的文学启蒙教育/44
- 三、赵弼的教谕身份与小说写作/67
- 四、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文学教育制度/79
- 五、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91

### 第二章 制度运行与文学/98

- 一、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性特征/98
- 二、明清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106
- 三、清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124

## 第二编 教育内容与文学

### 第一章 教育内容与文学变迁/145

- 一、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145
- 二、吕祖谦的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157
- 三、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166

## 第二章 教育内容与文学写作/185

- 一、西汉诸帝的文学教育与诏策写作/185
- 二、《韩诗外传》的文学教育内容/212
- 三、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228
- 四、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骈文教学/253

## 第三编 教育活动与文学

### 第一章 时代的教育活动与文学/267

- 一、春秋时期的文学教育与辞令/267
- 二、古代对课及其文化意蕴/281
- 三、明清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309
- 四、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332

### 第二章 作家的教育活动与文学/339

- 一、柳宗元永州时期的文学教育活动/339
- 二、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354
- 三、章学诚的课蒙学文法论/369

## 第四编 教育效果与文学

### 第一章 文学教育的文化功能/387

- 一、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特色/387
- 二、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社会意义/399
- 三、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410

### 第二章 文学教育的文学功能/422

- 一、唐传奇与进士科的文学教育/422
- 二、沈亚之的文学教育与小说创作/443
- 三、李昌祺的庶吉士教育与小说创作/452
- 四、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468

**参考文献/496**

一、古典文献/496

二、学术著作、论文集/514

三、学术论文、学位论文/520

## 绪 论

###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

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对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激励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重大作用。以横向的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学教育和纵向的世界现代文学教育作为参照系,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们拟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对此略加说明。

从教育目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具有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的鲜明特点。

人的活动都是有预定目的的活动。人根据预先设计的活动目的,在活动中进行选择 and 创造,使活动结果最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此,目的是人类对活动结果的一种指向和规定。无论古今中外,教育都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人为本,追求和实现人格的完善,这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亦即作育道德人格。如许慎《说文》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sup>①</sup>《中庸》说:“修道之谓教。”<sup>②</sup>《礼记·学记》说:“教也者,长善而救

---

①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27,页744。按,本书征引文献,于每节首次征引时注明版本,同节再次征引时只注册数、卷数与页码。

② 《礼记·中庸》,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625。

其失者也。”<sup>①</sup>这种教育理念,与某些西方近代教育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德国近代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就说:“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包括。”<sup>②</sup>但是一旦把这种教育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教育目标上,中国古代教育则显示出极为鲜明的特色。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所以官学的教育目的强调培养“建国君民”的统治人才<sup>③</sup>,行于民间的私学也主张“学而优则仕”<sup>④</sup>。而西方古代社会文化最初是神本位,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僧侣;文艺复兴以后人本位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反映在人才培养上,便强调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sup>⑤</sup>,通过修己正人,达到“明人伦”的目的。而西方传统文化更偏重于是一种知识型文化,教育的目的尤其注重通过知识学习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以人文教育为主,重在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在人文教育中,文学教育尽管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其目的指向却仍然是伦理教育,亦即伦理型人才的养成,而文学教育不过是达致伦理教育的津梁,培养道德人格的基础。孔子首倡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⑥</sup>。宋人陈祥道解释道:“学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sup>⑦</sup>“兴于诗”的目的,在于“立于礼,成于乐”,而礼、乐的本质则是一种伦理型社会和伦理型文化。《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sup>⑧</sup>。

正因为如此,古人一再强调,在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应该从属于伦理

① 《礼记·学记》,阮元:《十三经注疏》,页1523。

② [德]赫尔巴特(Herbart, J. F.):《普通教育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英]费尔金夫妇(Henry M. and Emmie Felkin)原译,尚仲衣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185。

③ 《礼记·学记》,阮元:《十三经注疏》,页1521。

④ 《论语·子张》子夏语,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532。

⑤ 《礼记·大学》,阮元:《十三经注疏》,页1673。

⑥ 《论语·泰伯》,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487。

⑦ 陈祥道:《论语全解》(清抄本),卷10。

⑧ 《礼记·乐记》,阮元:《十三经注疏》,页1528、1529。

教育;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①</sup>唐人裴行俭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sup>②</sup>南宋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sup>③</sup>张栻说:书院“岂将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sup>④</sup>。明人冯时可说:“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童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尝以此教不肖,而谆谆然令其厚养心地。”<sup>⑤</sup>直到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仍然宣扬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sup>⑥</sup>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这一点确立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这种重视道德人格养成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写作。如闻一多论及孟浩然诗歌的人格之美时指出:“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好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弊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西洋人作诗往往借故事或艺术技巧来表现作者个性,而中国诗人则重在直抒作者的胸襟,故以人格修养为最重要,因为有何等胸襟然后才能创

① 《论语·阳货》,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525。

②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90上《王勃传》,页5006。又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08《裴行俭传》作:“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页4088—4089。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本),卷74《白鹿洞书院学规》,页18。

④ 张栻:《南轩文集》卷10《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张栻:《张宣公全集》(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页1a。

⑤ 冯时可:《雨航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7册,卷下,页356。

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册,页6。



造出何等作品”<sup>①</sup>。闻一多的论述不仅指出东西方诗人所不同的道德观,而且阐明中国文学注重人格之美与“诗教”传统的密切关系。

叶燮《集唐诗序》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sup>②</sup>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活动,文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发现和欣赏“物之美”的“神明才慧”。如果我们暂且不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目标的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的性质,应该说,中国古人强调文学教育的目的在于“立人”,文学教育应该而且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精神修养、培养人的精神人格,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富含理论价值的合理命题。

从教育内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习惯等的总和。在中外学校的历史上,受教育目的的影响,学校教学内容的确存在着“文”(普通文化知识的学科)和“实”(自然知识学科)的区别。在西方,古希腊人“赞扬自由探究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sup>③</sup>,形成了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古希腊智者派提倡“三艺”教育(即逻辑学、修辞学、文法学),柏拉图完善西方古代课程“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二者共同组成所谓“七艺”,成为西方长达一千余年的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后来还因此而形成了文科学校和实科学学校的分类,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型。而在中国,学校始终未能出现这样的分化,甚至在一般学校教育中,实用学科(包括科学、技术、社会应用性学科知识)始终没有一席之地。中国古代社会重农轻商、追求仕途的文化传统,导致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在社会,教育内容大都以社会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化知识为主,很少有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的内容。同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因此教育往往把德育作为主要内容。

① 转引自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页128。

② 叶燮:《已畦文集》卷9《集唐诗序》,叶启倬辑:《郇园全书》(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页8a。

③ [美]伯恩斯(Burns, E. M.)、拉尔夫(Ralph, P. L.):《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1卷,页208。

至晚在商代,中国就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标志的官学教育内容体系,其中尤以尚文为主旨。东周以后出现的私学,主要的教育目的是传授历史文献和道德准则,因此同样定位于文化的性质,如孔子提倡文、行、忠、信“四教”<sup>①</sup>。中国从汉代起就形成单一经学教育的学校模式,这样模式又通过隋唐科举考试制度予以固定化、体制化,并逐渐渗透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秦汉以后,历代都把儒家经典,如“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要之,丰富的人文知识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而文学教育内容则涵容于“乐”、“文”或经典文献之中,文学教育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知识一直浑融一体,难以分辨。如《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sup>②</sup>正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以经学为主的文化教育混杂不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就其内涵而言,就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包含着“非文学”的要素;就其外延而言,就从来不局限于文学读本,而是广泛地涉及各种文献典籍。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的基本特点。

除了渗透在“五经”、“四书”之中的文学教育以外,中国古代比较纯粹的文学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三字经》、《千家诗》、《蒙求》等蒙学教材作为文学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以《文选》、《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学总集作为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的主要范本;第三,以各种诗法、诗格、韵书、词谱、曲谱等工具书作为文学写作知识的辅助读物。这三个方面的文学教育内容,仅仅作为经学教育的“拾遗补阙”而存在。

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始定小学、中学、大学各级学校中设置“中国文学”科<sup>③</sup>,于是文学教育终于从以经学为主的文化教育

① 《论语·述而》,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483。

② 同上书,页1342。

③ 《奏定学堂章程》,陈元晖主编,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小学见页304(分科名为“中国文字”),高等小学见页318—319,中学见页329,高等学堂见页338。

中分化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但即使如此,由于刚刚从综合性文化教育中分化出来,“中国文学”科的教育教学内容仍然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特点,体现出极强的综合性。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这种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特点,一方面固然不利于文学教育的独立发展和全面展开,但另一方面,它却相当切合中国古代“博学于文”的传统教育思想。《论语·雍也》篇记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sup>①</sup>同样的言论,又见于《论语·颜渊》篇<sup>②</sup>,可见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孔子所说的“文”,包括一切文化知识。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造成深刻的印象。《论语·子罕》篇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sup>③</sup>《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sup>④</sup>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流传,“博学于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培养“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这种通才教育,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能动性,具有教法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的鲜明特点。

教育方法包括教育者的教法和受教育者的学法两个方面。就教育者的教法而言,有语言的方法、直观的方法与实践的方法;就受教育者的学法而言,则有发现式和接受式两大类。这些都是古今中外优秀教育方法的共性,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方法的特性则另有所在。

首先,在教育者的教法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提倡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在中国古代学校中,教育、教学活动的重心往往不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系统讲授,而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孔子所说的:“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sup>⑤</sup>教师的教学,主要集中在启

① 《论语·雍也》,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479。

② 同上书,页2504。

③ 同上书,页2490。

④ 同上书,页2532。

⑤ 同上书,页2482。

发、释疑、析难、点睛、规劝、督促、评估等活动中,这样就使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生动活泼,充满生气。如:“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sup>①</sup>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讲究教法灵活多样,学校教育是如此,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是如此。

其次,在受教育者的学法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视诵读玩味,感知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明人胡侍说:“《参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心印经》云:‘诵之万遍,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从学者,不教,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苏东坡《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晦庵云:‘书贵熟读,读多自然晓。’《元史》侯均云:‘人读书不至千遍,终于己无益。’古人论读书之法,不过如此。”<sup>②</sup>古人要求从童蒙时学习诗文经典,就必须烂熟成诵,在诵读中玩味思索作品内涵,感受文学的审美,发现人生的乐趣,领悟文化的底蕴,从而完成文学的教育与人格的养成。中国古代这种朗读、感知、领悟的文学教学方法,非常契合文学作品抒情性、形象性、感染性的特点,更便于受教育者体会文学语言的韵律美、词藻美和修辞美,也更便于提升受教育者自身的审美感受、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近年来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提倡在中小学的文学作品教学中要运用形象思维的做法,其实这在古代的文学教育中早已有了充分的体现。

再次,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强调对话交流,互相启发。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常会有问对应答或论辩考校,通过多向交流,互相启发。如《论语》中孔子在弟子侍坐时,让他们“盍各言尔志”<sup>③</sup>。东晋时,一天大雪骤下,谢安问侄女谢道韞和诸子侄“何所似也”,谢朗答道:“散盐空中差可

① 孙培青、任钟印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58。

② 胡侍:《真珠船》(《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第338册,卷3,页31。

③ 《论语·公冶长》,阮元:《十三经注疏》,页2475。

拟。”谢道韞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sup>①</sup>朱熹谈到埋头读书与对话交流的不同效果时说：“载之简牍，纵说得甚分明；那似当面议论，一言半句，便有通达处。所谓‘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说到透彻处，何止十年之功也。”<sup>②</sup>可见师生、师友之间的对话交流，能使人受益无穷。而对话交流的归趋，则是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个人学习的能动性。所以朱熹又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sup>③</sup>引路者自然教无定法，而行路者重在自我探索。尤其是文学教育，在对话中培养受教育者自我理会、自我体察、自我涵养的学习习惯，这种做法最便于感受文学的魅力，也最便于达致审美的彼岸，它将使受教育者享用终身。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是：教育目标具有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旨在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教育内容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旨在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教育方法具有教法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能动性。此外，在文学教育效果、文学教育过程等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也有突出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 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

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有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遗忘的领域，这就是从创作主体（即文学写作者）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的角度考察文学怎样发生、发展及传播。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举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我们也可以津津乐道地谈论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因缘契合，但是我们却往往对具体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机制略焉不察，尤其是对这些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赖以发

①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96，页2516。

② 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17，页2809。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13，页223。

生和发展的主体因素知之甚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文学家或一个文学家群体是如何养成特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的,这种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如何生成具体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文学家个体或群体是如何进行终身的文学教育的,这种终身的文学教育又如何推动文学的历史演进?文学文本的阅读、欣赏、评论等接受活动如何再构文学家个体或群体的知识结构,从而与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独特的互动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究。这些便构成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这种教育行为的实施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大多注重学校教育,其实,对文学家来说,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对形成他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往往更为重要,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

文学教育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从而突破文学史研究的平面状态,创造文学史研究的立体空间。

第一,在“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文学教育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一位文学家文学创作发生的内在原因,也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一个时代文学现象发生的主体原因,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得以在坚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现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确认自身的文学史意义。

任何一位文学写作者之所以成为文学写作者,有能力创作文学文本,得以创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文本,显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归根结底与他独特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正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不同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经历,往往构成一位文学写作者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成为他的文学创作发生的内在原因。

例如,苏轼从小就受到系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打下了宽广而扎实的文学基础。他的父亲苏洵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一丝不苟,苏轼晚年在海

南檐州,还曾梦见年少时在父亲苛责下读书的情形:“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一本作始)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sup>①</sup>在父亲严厉督促下,苏轼不敢以天资颖悟而自负,而是发奋图强,苦学不辍,他曾将120卷的《汉书》手抄两遍,养成了博闻强记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苏轼还创造出一种“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sup>②</sup>

正因为苏轼读书破万卷,因此临文作诗,运用史料和典故总是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后人称:“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sup>③</sup>“腹有诗书气自华”<sup>④</sup>,苏轼早年接受的文学教育,对形成他学殖深厚、才气奔放、精深博洽的诗风、词风和文风,起到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后来黄庭坚正是有见于此,评价苏轼的词作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sup>⑤</sup>

苏轼的经历也是宋代文人的普遍经历。由于宋代文化教育普及、发达,养成宋代士人“无所不读”的基本生活方式<sup>⑥</sup>。这种铢积寸累、孜孜矻矻的读书求学经历,使宋代士人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使事用典的充分自由,从而形成有宋一代“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诗风、文风<sup>⑦</sup>。

第二,在“文学发展学”层面上,文学教育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一位文学家文学创作风格演变的内在原因和一个时代文学思潮、文学倾向演进的群体原因,从而在更为切实的意义上追踪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① 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41《夜梦》,页2251—2252。

②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60《与王庠五首》其五,页1822。

③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前集》卷38引《漫叟诗话》,页257。

④ 苏轼:《苏轼诗集》,卷5《和董传留别》,页222。

⑤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6《跋东坡乐府》,页7a。

⑥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73《答曾子固书》,页10a。

⑦ 同上。

轨迹,梳理文学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

在明嘉靖初年,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弘德七子”提倡的拟古风潮尚余波未歇。新一代的文学家如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原先都是“七子”派的追随者,王慎中“曩唯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唐顺之更是“素爱崆峒(李梦阳)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

到了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五年间,王慎中与王阳明弟子王畿过从甚密,接受了与前此以往不同的思想教育与文学教育,读书治学的取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文学趣味也随之转变。他“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经过这一番洗磨,王慎中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发生了变化,他“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顺之读他的这些新作,以为“头巾气”太重。王慎中说:“此大难事,君试举笔自知之。”唐顺之受他启发,从此埋头研读唐宋古文,心胸顿然开阔,其后创作“别是一机轴”<sup>①</sup>。

于是,他们在“七子”派之外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气,以为只要具备“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sup>②</sup>。因此他们创作出一批简雅清深、自然流畅的散文,“演迤详赡,蔚为文宗”<sup>③</sup>,成为其后性灵派文风的先声。而他们“掺杂讲学,信笔自放”的诗风<sup>④</sup>,却逐渐为世人所唾弃,成为“后七子”拟古风潮再度兴起的媒介。

由此可见,一位文学家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的形成与变化,不仅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得益于他步入社会以后所受到的终身教育。一位文学家在一生不同阶段的教育经历、读书经历,往往

① 以上引文均见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闲居集》卷10《遵岩王参政传》、《荆川唐都御史传》,页783,页788。

②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7《答茅鹿门知县》,页9。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丁集上“王参政慎中”,页374。

④ 同上。



会重构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从而促成他的文学创作风格的演变。而文学家文学创作风格的演变,有时甚至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蔚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因此,从文学教育研究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更为切实地描述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为深入地洞悉文学风貌更替的内在机制。

第三,在“文学传播学”层面上,文学教育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特定的文学文本、文学文体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密切联系,拆除文学创作研究与文学接受研究之间的藩篱,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文学文本和文学文体的文化特征,评判文学文本和文学文体的文化价值。

任何文学文本、文学文体一旦形成,它的传递和扩散便成为衡量这一文本或文体的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偏重于从“影响学”的角度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文体的传播,仅仅关注文学文本、文学文体对前代文学现象的继承和对后世文学现象的影响,从而构成一种简单的历史因果链。而文学教育研究的传播学视野,则着力从文化互动的角度考察文学文本、文学文体的传递与扩散的途径、形态与后果,力图构成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并置的立体研究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钩稽文学文本和文学文体的文化特征,揭示文学文本和文学文体的文化价值。

例如,承袭元中后期“举世宗唐”的余风<sup>①</sup>,尤其是在明初高棅辑录唐诗总集《唐诗品汇》以后,明代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股专宗盛唐的文学风气。如台阁体诗人杨士奇认为:“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sup>②</sup>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派作家更是高高举起“诗必盛唐”的旗帜,宗唐学唐风靡天下<sup>③</sup>。

① 瞿佑:《鼓吹续音》自题诗,见《归田诗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4册影印本),页611。瞿佑云:为《鼓吹续音》“撰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乃自为八句题于其后云:‘骚选亡来雅道穷,尚于律体见遗风。半生莫售穿杨技,十载曾加刻者功。此去未应无伯乐,后来尚复有扬雄。吟颂玩味常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

② 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5《玉雪斋诗集序》,页63。

③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286《李梦阳传》,页7348。